

# 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疏误补订八则<sup>\*</sup>

曾沁涵

**提要：**补充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未收录的志书（稿）4部；同时，对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中有关内蒙古、奉天、浙江、广东等省通志的著录信息有误之处，进行订正，以期对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有所增益和完善。

**关键词：**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地方志 疏误 补订

由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的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联目》），共收录30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190个单位所收藏的地方志8200多种，出版至今已30余年，仍是目前国内收入地方志最完备、最系统、应用范围最广的一部地方志工具书。但受客观原因影响，《联目》中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。本文通过梳理档案文献，补充《联目》缺失的《上海市通志稿》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《察哈尔省通志》《江西通志稿》4部志书，并就《联目》中收录《内蒙古地理》《奉天通志》《重修浙江通志初稿》《广东通志稿》4部志书时存在的错误，予以订正。

## 一 柳亚子等纂《上海市通志稿》

1932年7月14日，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。柳亚子、朱少屏分别担任正副馆长，徐蔚南为编纂主任，胡怀琛、吴静山、蒯世勋、席涤尘、胡道静、蒋慎吾、郭孝先、李纯康、董枢等为编纂。是年11月，通志馆拟定《上海市通志拟定编目》，依据“总论”“本论”和“结论”性质，将25个编目划分成“二百几十个总目，六百几十个子目”，范围囊括上海古今历史文化，内容堪称完备，这为编修上海市通志奠定了重要基础。<sup>①</sup>然而，由于对修志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，通志馆同人在资料征访、资金与管理等方面遇到严重问题，导致志稿编纂进度严重受阻。至1933年4月，即通志馆成立9个月之后，成稿者仅有学艺、法租界、社会事业和金融4编。1935年底，通志馆成立已有三年半，全志完稿之日仍遥遥无期，遂不得不调整修志年限。次年7月，馆长柳亚子宣称，通志初稿“已编纂完竣”，后续工作为整理、校阅、修正、复阅和印刷，并且联系中华书局，拟将初稿前2编80万字的内容先行印出。<sup>②</sup>事实上，至1937年8月，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导致通志馆工作暂停之时，也仅完成了沿革、公共租界、法租界、地文、政治、外交、金融、工业、农林渔牧、学艺、社会事业、大事记等编的初稿，总字数达1000万字。其中，沿革、公共租界、法租界3编已审阅定稿，准备付梓，而剩余各编尚待编纂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抗战期间，日本扶植的伪上海特别市政府于1942年8月12日设立“通志馆筹备处”，虽然每月由特别市政府下拨4万元修志经费，但并未实际开展修志工作。<sup>③</sup>抗战胜利后，通志馆于1945年11月24日恢复，胡朴安为馆长，吴静山为编纂主任，原编纂胡道静、席涤尘、郭孝先、徐邃轩、蒋慎吾等人

\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民国通志馆与近代方志转型研究”（项目编号：13CZS042）阶段性成果。

① 参见柳亚子：《磨剑室文录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1100页。

② 参见上海市通志馆编：《上海市年鉴（1936）》，中华书局，1936年，第54页。

③ 参见《日伪上海特别市政府关于通志馆组织的文件》（1942年8月12日），档案号：R1-18-758，上海市档案馆藏。

悉数回归，复员后的通志馆工作主要为征集志料、筹备编纂与编撰年鉴等。1947年7月1日，通志馆改组为文献委员会，下设编纂组、采访组、整理组、总务组和会计室，但未及开展工作，因胡朴安病故，加之时局紧张，直到1950年6月划归上海市文化局，文献委员会“始终也没有完成《上海市通志》，并且已写定的稿也没有出版过一本”<sup>①</sup>。总之，（民国）《上海市通志稿》含3编排印稿，计70万字；11编已成稿，计277万字；10编未成稿，计203万字，现仅存14编，约355.3万字，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。2013年，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、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共同编印的《民国上海市通志馆（第一册）》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印行。

## 二 李肇甫修，舒君实、陶元甘等纂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

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的编纂，肇始于1942年5月21日四川省通志馆之成立。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肇甫为通志馆馆长，舒君实为主任秘书，曾科澄、陶元甘分任总务和采访组组长。<sup>②</sup> 通志馆成立后，主任秘书舒君实受商务印书馆出版《江苏六十一县志》的启发，建议仿照该书编纂一部小型省志。此议得到全馆上下一致同意，尤其是馆长李肇甫，“慨文献之无征，惧公币之虚耗，乃建议于馆长李伯申先生，而有四川省方志简编之纂修”，并立即安排人员着手编修事宜。<sup>③</sup> 采访组及总务组人员参与到志书的编纂工作。按照此书的架构设计，在具体分工上，《总论》部分由采访组组长负责编写，即概述四川全省情况；《分论》则以每县列一专节的形式，分别交给其余人员编写。1944年全志编纂完成，共9册，60余万字。<sup>④</sup> 志书完稿后，由舒君实润饰文字，陶元甘校阅。<sup>⑤</sup> 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编纂完成后并未印行，而通志馆“限于经费，无款雇人缮写”，出于保存文献的考虑，只好交由馆内职员抄写。由于通志馆决定“以抄写之多寡为成绩之殿最，酌予奖叙”，故馆员们抄写颇为勤奋，至1944年8月，全志抄写完毕。按照奖励办法，馆长李肇甫于是月11日，呈请省政府人事室，对相关抄写人员予以奖励，其中办事员冯藻光还因“抄录方志简编成绩甚著”擢升为三级组员。<sup>⑥</sup>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全稿移交四川省图书馆保存。

## 三 宋哲元等修，梁建章等纂《察哈尔省通志》

1932年7月，宋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。次年，侵华日军攻占山海关，宋哲元率军奔赴北平附近投入长城抗战，不久取得“喜峰口大捷”。<sup>⑦</sup> 正是在这一年，宋哲元以“立国之道，在有以首建规模，振其文化”为宗旨，“谋省志之创修”，经过多方筹备，1934年1月察哈尔通志馆正式开馆。在宋哲元的主持下，通志馆聘省政府秘书长杨兆庚为馆长，并且聘请“一时名宿”担任编纂，由此开展省志编修工作。而据通志馆总纂梁建章称，察哈尔省以往并无省志，虽有县志也已年久失修，加之连年兵灾，修志工作陷入资料严重缺失的尴尬境地。对此，通志馆同人在

<sup>①</sup> 胡道静著，虞信棠、金良年编：《胡道静文集 序跋题记 学事杂忆》第7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07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《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555次会议决议案》（1942年5月21日），档案号：资1 $\frac{12}{4}$ ，顺序号279，四川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李肇甫：《四川省方志简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1页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《四川省通志馆公函》（1944年12月5日），档案号：民042-02-2781，四川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陶元甘：《记四川通志局及四川省通志馆》，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：《四川文史资料选辑》第32辑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，第171页。

<sup>⑥</sup> 参见《四川省通志馆呈》（1944年8月11日），档案号：民042-02-2781，四川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曹子西主编：《北京历史人物传（下）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845页。

梁建章主持下，以国家成立三要素，即土地、人民、主权“三者为经，而以各事分隶之以为纬”，并且依据《调查纲目》，广泛调查察哈尔省的地理形势、山水河流与建置情况，搜集了大量数据资料，志稿编纂工作历时一年半，即成书28卷，内容包括疆域、物产、户籍、执业、政事、蒙古、大事记等，编纂工作于1935年6月全部完成。<sup>①</sup>值得一提的是，通志馆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完成编修工作，与编纂人员较高的学识和人文素养不无联系。考察通志馆编纂人员学历背景可以发现，总纂梁建章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，分纂余宝龄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，吕震毕业于日本东京宏文学院，刘续曾毕业于日本师范大学，即馆内编纂人员大多具有海外求学的经历。此外，馆长杨兆庚毕业于日本东京师范，通志馆采访、书记、校勘、录事等人员，也大多为科举或新式学堂出身，堪称具有才识之士，这无疑为宋哲元在《察哈尔通志》序言中所称“聘一时名宿，任馆长、编纂、分纂职”一语，作了很好的注解。<sup>②</sup>

#### 四 吴宗慈纂《江西通志稿》

1940年12月20日，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命令下，江西省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。作为筹备委员会委员，吴宗慈主持拟定《江西省通志馆组织规程》（草案），为次年4月江西省通志馆的成立奠定基础。通志馆成立后，吴宗慈担任馆长兼总纂。根据《组织规程》，通志馆设立编修、编纂两个部门，负责省志编修的设计与实施工作，另设总务室，办理文书、庶务、图文资料保管事项。此外，通志馆设协纂、分纂共4人，由省政府“聘国内学术机关及省属各行政机关人员或公法团主持人员兼任”，负责具体编纂事宜。<sup>③</sup>自1941年起，通志馆进行文献整理与资料征集工作。在吴宗慈的主持下，通志馆分别拟定《江西通志体例述旨》和《调查纲要》，将志稿分为纪、表、考、略、录、传等门类，并仿章学诚三书之义，形成典例征、文征和志余3个体裁。<sup>④</sup>循着“求其用”的编纂理念，吴宗慈以讲求“方志之实体效用”为旨归，提出“注意精神物质之普遍适用”，“注意储备方志资料省时节费之根本办法”以及“注意全国性”的修志原则。在修志实践中，吴宗慈将上述原则视为“今日之方志学”的根本要求，力求实现方志学内涵的创新与升华。<sup>⑤</sup>需要指出的是，江西通志的编修正值抗日战争期间，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，江西省成为侵华日军进犯的重要目标。据统计，抗战期间江西全省伤亡者约计504450人，财产损失达10072.023亿元，这给包括修志工作在内的社会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影响。<sup>⑥</sup>在此背景下，吴宗慈等人冒着日机轰炸的炮火威胁，先后辗转泰和、遂川、宁都、南丰等地，在极其危险的条件下坚持修志工作。经过9年的艰辛编纂，至1949年通志馆同人编成多种志材专稿。这些志稿门类繁多，内容丰富，既有历代江西大事记、疆域沿革，也有财政、经济等社会新兴事物，内容约7000余万字。<sup>⑦</sup>通志馆解散后，这批志稿的油印本及铅印本保存在江西省博物馆。1985年，江西省博物馆成立民国《江西通志稿》整理组，历时近8个月，形成一部100册的影印本。

<sup>①</sup> 参见《察哈尔省通志馆调查纲目（附说明）》（1934年1月15日），档案号：L037-002-0747-0014-0042，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藏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宋哲元等修，梁建章等纂：《察哈尔省通志》第1册，民国24年（1935）铅印本，第1、2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《江西省通志馆组织规程》（1941年4月1日），档案号：J046-1-00510-0099，江西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吴宗慈：《江西通志体例述旨》，藏于江西省图书馆古籍部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吴宗慈：《论今日之方志学》，《江西文物》第2卷第2期，1942年。

<sup>⑥</sup> 参见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：《江西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0、14页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吴宗慈修，辛际周、周性初等纂：《江西通志稿》第1册，1985年江西省博物馆影印本，第20、21页。

## 五 许崇灏编《内蒙古地理》

原条：

(民国)《内蒙古地理》

许崇灏(公武)编,民国26年(1937)铅印本

1957年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铅印本

(民国)《漠南蒙古地理》

许崇灏(公武)编,民国36年(1947)南京正中书局铅印本

订正：

1937年6月,许崇灏编著的《内蒙古地理》由南京新亚细亚学会正式出版。该志撰述之缘由,无疑与1937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前后中国边疆局势日益紧迫有关。基于“内蒙古居国防之最前线”,而“为方志之阙”的认识,许崇灏以“建设边疆巩固国防”为宗旨,从“不涉议论,而务切实用”的角度编纂是志。<sup>①</sup>此举获得蒋作宾、吴忠信、戴传贤等人的高度评价,戴氏为志书题签,蒋、吴二人亲自为该志作序。

《漠南蒙古地理》则于1945年6月作为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之一,由抗战时期迁往重庆的正中书局出版。事实上,该志出版缘于1941年成立的中国边疆学会的一项出版计划。而在1943年4月“中国边疆学会丛书”第一辑出版之际,赵守钰、顾颉刚、马鹤天、黄奋生4人共同为这套丛书作序,不仅历史性地提出“边疆学”概念,而且鼓励学界“本着救国建国的热忱,要从边疆工作上来负荷起时代的使命”<sup>②</sup>。正是本着这一时代使命,丛书将许崇灏于1937年出版的《内蒙古地理》,以《漠南蒙古地理》为名再版。从内容上来看,再版后的志书删除了原书的3页8幅插图,而全书涉及“内蒙古”的地名全部替换为“漠南蒙古”,以与再版后的志书名称相符;此外再版时还将蒋作宾、吴忠信序言中的日期删除,其余略作更动。

抗战胜利后,正中书局迁回南京,其在全国的27个分支机构先后恢复营业。而其设在上海的分局,于1947年10月再版了《漠南蒙古地理》。从篇章、内容、版式、页码等来看,再版时未作任何改动。需要指出的是,1957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地理系孙金铸所著《内蒙古地理》由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铅印出版,《联目》将其误为许崇灏所著,显然有误。故笔者认为《联目》有关此则地理志的条目应更正为:

(民国)《内蒙古地理》

许崇灏(公武)编

民国26年(1937)南京新亚细亚学会铅印本

民国34年(1945)重庆正中书局铅印“中国边疆学会丛书”本

注:书名题《漠南蒙古地理》。

民国36年(1947)上海正中书局铅印本

注:书名题《漠南蒙古地理》。

## 六 翟文选等修,王树枏等纂《奉天通志》

原条:

<sup>①</sup> 参见黄奋生:《边疆政教之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,1947年,第3页。

<sup>②</sup> 许崇灏:《漠南蒙古地理》,正中书局,1945年,第3、4页。

## (民国)《奉天通志》

翟文选等修，王树枏等纂，民国23年（1934）铅印本

订正：

该志于1928年11月1日由奉天省长公署设馆编修，白永贞、袁金铠分任正副馆长，王树枏、吴廷燮、金梁分别担任总纂。省长翟文选任通志馆副总裁，总裁则由时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担任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伪奉天省政府成立，伪政府省长臧式毅主持馆务。1933年2月，总纂王树枏、金梁因故去职，至1934年总纂吴廷燮亦因年事已高难堪重任，遂增聘精于“文献掌故之学”的金毓黻为总纂。<sup>①</sup>经金毓黻与馆内同人努力编修，至1934年9月17日，全志尚有119册“应缮之稿”，约297.5万字，而全部志稿清缮完毕，其工作量以字数计，当在727.5万字，修志任务可谓十分艰巨。<sup>②</sup>然而，到1935年6月，沿革志、氏族志、田亩志、礼俗志、职官志、物产志、实业志均已校成定稿，按照“编印兼行”办法，拟提请付印；大事志、山川志、民治志、选举志、交通志、人物志也“行将脱稿”；艺文志、金石志、建置志、疆域志、财政志、教育志、军备志则由金毓黻召集馆内同人加以“补辑”。至1935年12底，通志馆迫于时局与经费紧张而闭馆时，全志260卷10函100册全部印行。故是志编修者为翟文选、臧式毅、袁金凯等人，编纂者包括王树枏、吴廷燮、金梁、金毓黻等人；志书印行时间应为1935年。《联目》有关此则志书的条目应更正为：

## (民国)《奉天通志》

翟文选等修，王树枏等纂，民国24年（1935）铅印本

## 七 余绍宋等纂《重修浙江通志初稿》

原条：

## (民国)《重修浙江通志初稿》

浙江省通志馆修，余绍宋、孙延钊等纂，稿本，民国37年（1948）铅印本

订正：

该志于1943年8月16日由浙江省政府设馆编修。余绍宋、凌士钧分任正副馆长，孙延钊为总纂，项士元、宋慈抱、陈锡钧、祝鸿逵、洪煥椿等人忝列编纂人员。在馆长余绍宋的主持下，通志馆同人将“科学方法”和“修志为用”纳入旧志革新的范畴，定通志类目为纪、考、略、传、谱五纲，既批判地吸收了前人修志经验，又根据时代发展实现了修志理念的鼎革。<sup>③</sup> 经过通志馆同人的持续编纂，1948年7月通志初稿《田赋》篇印行出版，其余各篇拟根据完稿时间分期付印。<sup>④</sup> 然而，正当编纂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，国共内战所造成的政局动荡严重影响到修志工作的正常开展。在此背景下，1949年3月，通志馆因时局紧张宣告“停顿”，编纂人员全部“遣散”，重修《浙江通志》工作就此结束。<sup>⑤</sup> 可见，1948年所印志稿仅是部分内容，故以“初稿”命名，而其他尚未完稿或整理形成的采访册，于1984年由杭州古旧书店重印（又称眷录本）。2010年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全稿连同馆刊有关内容重印出版，形成《重修浙江通志

<sup>①</sup> 参见辽宁省档案馆：《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》，辽沈书社，1983年，第118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金毓黻：《静晤室日记》第5册，辽沈书社，1993年，第3409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《略评旧志浙江通志兼述重修意见》，《浙江省通志馆馆刊》1945年第1期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《浙江省通志馆报告》（1943年8月16日），档案号：L050-000-097，浙江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《浙江省通志馆电》（1949年3月15日），档案号：L050-000-063，浙江省档案馆藏。

稿》标点本 15 册。故是志书名应为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；著者项应改为余绍宋修，孙延钊等纂。《联目》有关此则志书的条目应更正为：

(民国)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

余绍宋修，孙延钊等纂，稿本，民国 37 年（1948）铅印本

## 八 邹鲁修，温廷敬等纂《广东通志稿》

原条：

(民国)《广东通志稿》

广东通志馆纂，民国 24 年（1935）修，广东通志馆稿本

订正：

该志书于 1932 年 8 月 1 日，由国立中山大学奉广东省政府之命设馆编修。中大校长邹鲁兼任通志馆馆长，聘请该校教师徐甘棠、朱谦之、朱希祖、罗香林、冼玉清等人参与编纂，其中朱希祖、温廷敬先后主持编纂事宜。<sup>①</sup> 在编纂宗旨上，馆长邹鲁秉持“编纂适应时代的省志”的要求，力求志书反映社会时代风貌。<sup>②</sup> 至 1935 年底，通志列传、外务、宦绩、艺文、古迹等编纂工作均有所推进。按照“凡一门类编成，先行出版”的编印原则，将温廷敬编纂完成的列传 4 卷于 1936 年先行出版。<sup>③</sup> 直至 1936 年，全志仍未完稿，其中“列传”除温廷敬已出版的 4 卷外，又撰写“列传若干卷，拟继续付印”。而其他拟规划出版的有：宋元列传十卷，古迹略十卷，教育略十卷，艺文略先成经史部十卷，物产略十卷，宦绩传（录）十卷。在出版经费方面，根据《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》所列预算，“每卷约印刷费三百元，计本届需印刷费壹万元”。按此预算标准，全部志书总 700 卷，共 300 本，需要出版经费 15 万元。<sup>④</sup> 然而，上述经费因校款支绌而难以拨付，导致志稿编印难以为继，遂不得不将全志完成时间由“三年”调整为“五年”。1937 年，侵华日军南下造成时局动荡，9 月 11 日，中山大学发出《关于通志馆暂行停办一事的训令》，宣告修志工作暂停。<sup>⑤</sup> 至此，通志馆仅出版了《广东通志列传》4 卷本，其余皆为稿本，其中还有一些是未完成编纂的采访册。故是志书名应为（民国）广东通志未成稿；著者项应改为邹鲁修，温廷敬等纂。志稿印行时间应为 1936 年。《联目》有关此则志书的条目应更正为：

(民国)《广东通志未成稿》

邹鲁修，温廷敬等纂，民国 24 年（1935）修，广东通志馆稿本

以上 8 则关于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疏误的补订，主要依据档案文献考订而成，期待能对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有所增益和完善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图书馆编目部）

本文责编：周 全

<sup>①</sup> 参见朱希祖：《朱希祖日记》，中华书局，2012 年，第 156、157 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邹鲁著：《邹鲁回忆录》，东方出版社，2010 年，第 273 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秘书处编辑：《国立中山大学现状》，民国 24 年（1935）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铅印本，第 256、257 页。

<sup>④</sup> 《广东通志馆期成计划书》（1936 年 1 月 31 日），档案号：020-001-74-070-074，广东省档案馆藏。

<sup>⑤</sup> 《关于暂行停办通志馆的文》（1937 年 9 月 11 日），档案号：020-001-74-063-064，广东省档案馆藏。